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15

德川時代

日本儒學史論集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張寶三、徐興慶◎編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15

德川時代

日本儒學史論集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張寶三、徐興慶◎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張寶三、徐興慶編

---初版--- 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

2004〔民93〕 299面；15*21公分

含索引

ISBN 957-01-7824-8

1. 儒家-日本-論文、講詞等

131.307

93012717

統一編號 1009302313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15

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

編者：張寶三、徐興慶

策劃者：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出版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行人：陳維昭

發行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地址：臺北市 106 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話：02-23630231 轉 3914

傳真：02-23636905

E-mail：ntuprs@ntu.edu.tw

2004年8月初版

ISBN 957-01-7824-8

定價：新台幣 350 元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策劃)

(按姓名筆劃排列)

- 召集人** 李弘祺 紐約市立大學／臺灣大學
- 主編** 黃俊傑 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
- 編輯委員** Benjamin A. Elman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 子安宣邦 日本大阪大學
- 古偉瀛 臺灣大學
- 甘懷真 臺灣大學(常務編委)
- 李明輝 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
- 吳文星 國立師範大學(常務編委)
- 吳展良 臺灣大學
- 高明士 臺灣大學
- 陸揚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常務編委)
- 張隆溪 香港城市大學
- 張寶三 臺灣大學
- 陳昭瑛 臺灣大學
- 楊儒賓 國立清華大學(常務編委)
- 劉述先 中央研究院
- 鄭吉雄 臺灣大學(常務編委)
- 蔡振豐 臺灣大學(常務編委暨執行編輯)

序

黃俊傑

《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這部書，是臺灣大學中文系張寶三教授與日文系徐興慶教授合編的論文集。兩位編者長期浸淫於日本儒學研究，他們深感日本學人有關日本儒學的論著不僅數量可觀，每年如排山倒海而來；而且，其中品質精良，值得誦讀再三者亦不在少數。爲了讓中文學界之有心於日本儒學的同道，也能對日本的相關研究業績有相當的瞭解，張教授與徐教授從當代日本學者的論著中，精選了這六篇論文，並邀請一批青年學者逐譯爲中文，輯爲本書刊印，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中日兩國雖然地緣接近，文化關係密切，但是雙方的相互瞭解並不對等。日本從中古時代以降，就大舉接受中華文化的洗禮，例如「大化革新」深受大唐文化之影響，德川時代廣泛吸收中國儒學並加以消化，明治維新則與陽明學說有其思想上之關係。由於歷史的積澱，日本知識界對中國學問的研究，有其悠久的歷史傳承，德川時代的儒學研究更是蔚爲主流。但是，中國自古是東亞歷史悠久的古國，中華帝國結構穩定，自成一箇「天下」，中國知識界之「文化唯我論」心態頗爲強烈，所以對於包括日本在內的鄰邦的興趣不大，更遑論深入研究？早在1884年（日本明治17年，清光緒10年），日本學者岡千仞（鹿門，1833-1914）旅遊中國，經由歷史地理學者楊守敬（1839-1915）

的介紹而與李慈銘（1829-1894）見面。岡千仞對李慈銘說：「我邦學者無不涉中土沿革，而中土學士矇然我邦沿革。譬猶用兵，我瞭敵情，敵矇我情，非中土之得者。」¹這場會面在岡千仞的《觀光紀游》與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中均有記載。岡千仞的說法大致符合實情。直到民國 17 年（1928 年）戴傳賢（季陶，1891-1949）出版《日本論》，更極力呼籲：「我勸中國人，從今以後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功夫。」²戴季陶的痛切呼籲至今已經七十六年，海峽兩岸中文學術界對於日本文化與思想的研究雖已累積若干成果，但仍有待大力提昇。

由於深感中文學術界對日、韓地區研究的不足，所以，臺灣大學的許多同仁一起合作推動《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2000-2004）的同時，對於當代日本與韓國學者相關論著的中譯，也付出相當的精力。現在刊印的這部《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就是張教授和徐教授共同努力的初步成果。

這部書結集六位當前日本研究德川儒學的著名學者的論文，六位作者與臺灣學界都有相當的關係，各篇論文所探討的主題雖然各不相同、取徑互異，但是各篇論文對於相關研究文獻，尤其是學說史的檢討都賦予高度的重視。舉例言之，本書第三篇作者平石直昭的論文，全面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日本學術界，有關荻生徂徠的各種論著，並以丸山真男

¹ 參見岡千仞：〈燕京日記〉，卷上，收入《觀光紀游》（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頁154。

² 參見戴季陶：《日本論》（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年），頁3。

與吉川幸次郎的學說爲中心，就是一篇值得精讀的論文。這篇論文不僅使中文讀者對於徂徠學有更深入的瞭解，而且對於當代重要學者如丸山真男、吉川幸次郎、甚至尾藤正英等人的學問，也有更深刻的體認。此外，本書其他各篇的內容，對中文讀者也深具啓發性，例如：渡邊浩探討朱子學之後中日思想界的異同，黑住真分析儒學在近世日本社會的普及化，辻本雅史討論十八世紀下半葉，儒學在日本社會的深入影響，本鄉隆盛研究藤田幽谷的〈正名論〉，宮城公子研究她所謂「儒學史上的幕末」時期之實學思想往近代日本社會下層滲透，凡此種種論述，都具有新意，而值得中文讀者細嚼品味。

展望未來，日本儒學史研究這個領域在海峽兩岸中文學術界，必將日新又新，綻放異彩。我相信，張教授與徐教授合編的這本《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將發揮承先啓後之作用，在這個學術領域中留下不可磨滅的足跡。在這本書付梓出版之際，我特別向原作者、編者及譯者，敬致祝賀與感謝之意。

2004年4月14日

於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導言

徐興慶

一

儒學於東亞文明之發展過程中，乃是一極為重要之課題。尤其自近世日本的德川幕府將朱子學列為官學以還，至十八世紀後期則又出現了折衷派、正學派朱子學。在思想與立場上，朱子學派與陽明學派、古文學派、水戶學派、闇齋學派等，彼此間之主張都存在著異同之互動關係。儒教的主題不但與近世日本社會的演進息息相關，截至明治維新前後，它更影響到日本的近代化。

本書收錄日本學者探討德川時代與儒學有關的論著六篇，研究範圍涵蓋與東亞文明淵源甚深的中、日二國之儒學發展之相關背景。首先就各篇論文作者的研究領域、方法及相關成果逐一介紹，再說明各篇論文的主要內容與其論述之重要課題，以供讀者參考。

二

第一篇論文〈儒學史異同的解釋：「朱子學」以後的中國與日本〉，¹作者渡邊浩先生，現任東京大學教授，專長為日本政治

¹ 渡邊浩：〈儒学史の異同の一解釈—「朱子学」以降の中国と日本〉，收錄於

思想史。為避免只專注於單一國家研究而陷於狹隘認知，渡邊教授經常從多角度的視野，研究與東亞儒學發展最密切的中、日、韓三國之間的政治、儒學思想之比較。渡邊教授的研究領域極為寬廣，研究對象不侷限於儒家思想，亦不執著使用某種特定的研究方法，經常將研究對象置於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儘可能對其作正確認知，同時著眼於當代思想對現代人具有何種意義而對之進行探究，從此角度切入，以擷取現代思想所以形成的研究素材。渡邊教授之主要論著包括《近世日本社會與宋學》、²《東亞之王權與思想》，³皆為與中日及東亞儒學思想有關之比較研究。

渡邊教授於該文首先指出，中日兩國在儒學的發展史中，雙方皆以朱熹（1130-1200）為代表的「道學」——即廣義的朱子學——為其有力之主軸而存續；另一方面，批判朱子學的思想仍不斷出現。也就是說：雙方的儒學史之基本結構很相似，而且雙方批判朱子學的內容與形式往往也是相去不遠。雖然如此，雙方儒學史之差異性亦相當明顯。例如：在中國，當朱子學居於穩固的主流地位後，其他思想隨即試圖對抗此已然成為主流思想的朱子學。相對於此，日本德川時代前半，朱子學開始正式被學習的同時，其他異質且新潮的儒家思想亦相繼出現，儒學因而得以全面普及。諸多學派與朱子學同時並存而且持續擴散。當陽明學在中國擁有極大的影響力時，其於日本的影响力卻不大。再者，中國朱子學批判者多半是藉由重新詮釋

《東アジアの王權と思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第3章。

² 渡辺浩：《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

³ 前引渡辺浩：《東アジアの王權と思想》。

朱子學的內涵，而持續活用「理」這一概念，然日本的朱子學批判者往往言明其對「理」的不信與質疑。

中國與日本之儒學思想史中，存在著上述之近似與差異，此於更大的歷史脈絡中具有何種意義，乃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渡邊教授希望藉由本文能建立起解決上述提問的基礎。

渡邊教授學出雙方比較、詮釋儒學思想的多種方法。將日本或中國視為文化接觸的一個例子加以詮釋，即是其中一種；但在本文卻不採用此種方法。渡邊教授表示：原本中日二國的文化即存在著共通性及差異性，因此，儒學史亦產生了相近與差異。例如：二者對「理」的態度上的差距，便可解釋為其乃二國文化或二國人民的「思考模式」、「精神構造」、「心性」、「民族性」之不同使然。此種方法，亦適用於將「中國之學」（唐國之「學」）視為是「方形」的、拘謹的、正經的。相對地，自認為「我皇國之古道」是「圓且平」的（賀茂真淵《國意》）國學者之自我形象，在繼承了戰前、戰中的日本精神論之後，成為戰後許多描述日本文化論、日本人論時的日本人之自畫像。若吾人相信此種自畫像是貫穿歷史的真實，則先前的詮釋就具有很大的說服力。雖然，儘管我們可暫時不以「文化」、「民族」等單位為當然之前提而來論其「固有」之特徵。渡邊教授認為上述的論述方法，存有以下幾個難處。第一：其各自的文化特徵並非以其儒學史為重要之資料而將之萃取出。特別是諸如所謂：「中國人（或日本人）如此想，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有如此思考的基本傾向，這點從他們的思想中即可看出。」此類的循環論述方法難以避免。第二：該方法著眼於貫穿歷史的特質，其結果難以說明歷史的變化與發展。

渡邊教授認為所有的思想史並非都具備無可類比的特性，亦非絕對不可比較的。同樣生活在這世界上的人類，有時彼等遭遇到的思想、社會等各種問題會有許多共通點，而諸如人類該如何共存之類的課題，即可就此共通點來進行比較。我們亦可注意思想賴以成立之社會的「場域」，將特殊的「場域」作為可以擴張的架構而加以理解，如此一來進行比較應該是可行的。因此，渡邊教授在本文當中針對（一）明代：與「功利」的競賽和陽明學、（二）清代：「情理」與「考證學」、（三）日本：德川時代等三個主題加以論述。

渡邊教授指出，日本德川時代儒者的出身來自各種階層，但他們通常受到如同醫生般的待遇。事實上，身為「儒醫」而身兼二職的人為數不少。但是擔任「御用儒者」，直接參與政事的情況則不多，因為當時「治國不用儒者」的想法是為常識，渡邊教授將此種情況稱為「儒者」們的悲哀。渡邊教授另外指出，德川社會與中國不同，其政治與社會制度皆不背負將「古聖先賢之道」視為正統而加以繼承的神聖性。蓋記載著「禮」的古「經」世界與現實難有交會之處。事實上掌握政治實權者是「御公儀」（幕府）的「公方樣」（將軍），他不以「聖天子」自命，在德川時代中没有「六部」之制，取而代之的是老中⁴與三奉行⁵，武家的禮儀亦難以稱之為文雅。從新井白石（1657-1725）及徂徠學派的學者皆希望制定制度，與山縣大貳（1725-1767）

⁴ 「老中」，是江戶幕府的官職之一，總理幕政，直屬將軍，位高權重，掌管朝廷與諸侯之間的政務大事。其編制僅有4至5名，每月以「月番」的方式交替勤務，通常由俸祿領有3萬石以上糧餉的「譜代大名」充任。

⁵ 江戶時代的三奉行為勘定奉行、寺社奉行及町奉行。

批判武家等這些事情來看，即可得知武家的統治制度中，無禮乃是儒者之一般認知。

至於與「理」共存構想的部份，渡邊教授認為在日本儒學形成的十七世紀以前，那些對儒學感到興趣的人，首先學習宋、元、明及朝鮮「理學者」的作品，但結果仍以朱子學系統為中心。原因是：（一）朱子學是無與倫比的集大成之學。其中有回答對「修己」與「治人」之道的摸索、對「歷史」的興趣、對「禮」的關心、對博物學的探求、對詩文的好尚等各種豐富的內容。實際上，日本的朱子學者是多樣化的。（二）興盛於明代的陽明學是一對抗正統朱子學之思想，或者是朱子學再度活性化之嘗試。日本在沒有正統朱子學之狀況下，陽明學亦沒有流行之理由。換言之，日本儒者沒有必要或準備為了從「功利」、「偽善」中逃脫出，而深入「隨處體認天理」、「靜中養出端倪」、或是強調「慎獨」這類的明代修養論。（三）在同時代的中國、朝鮮，朱子學有著正統教義的權威，所以理所當然地，德川時代的儒者首先學習的是朱子學系統的儒學。但是朱子學是激烈高唱「理」之尊嚴的思想，是希望藉由「理」的完全實現，為當下的世界帶來理想秩序的思想；這樣的思想在德川時代不可能輕易被完全接受。在本文中，渡邊教授將焦點置於當時政治的核心問題與人類共存的構想，於此基礎上進行討論其與「理」的關係。

三

第二篇論文〈儒學與近世日本社會〉，⁶ 作者為黑住真先生，現任東京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專攻日本思想史、倫理學、比較思想宗教。代表著作有《近世日本社會與儒教》、⁷《複數性之日本思想》⁸等。

本文主要在探討儒學與儒者在近世日本社會演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黑住教授首先說明近世日本儒學係從幾乎沒有背景和勢力的狀態下發足，亦即儒學是伴隨著太平的到來，隨著社會之深化而逐漸扎根於近世日本社會中，但是儒學這一類型的思想體系也決非獨占著整個日本近世的思想界。換言之，儒學原本是從脆弱且某種限定的狀況中出發，再慢慢拓展其勢力而為人所接受。因此，在日本近世初期，儒學並不是一種熱門的學問形態，儒者的地位亦不崇高。至近世前夕可以從事儒學，提供儒學發展的只有宮廷周邊少數的博士家、神道家以及禪僧們，其中可稱為儒學專家者只有博士家而已。但是，這也只是侍奉朝廷周邊的少數知識分子所從事的一種文化傳授家業。當時日本並無像中國、朝鮮那般勢力龐大的儒學官僚階級存在。

其次，黑住教授分析近世日本的儒學之所以得以發展，是

⁶ 黑住真：〈儒学と近世日本社会〉，收錄於《岩波講座：日本通史》第13卷（東京：岩波書店，1994年）。

⁷ 黑住真：《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東京：ぺりかん社，2003年）。

⁸ 黑住真：《複數性の日本思想》，近刊。

因為武士政權選擇了避免依存於朝廷文化，試圖在自身霸權掌握之下，利用其權勢在某種程度上自己掌管、處理文化生產之事。黑住教授學藤原惺窩（1561-1619）離開禪林，身著「深衣道服」表示其為儒者的這種異樣風格，以儒宗之姿出現在德川家康（1542-1616）面前，及其門人林羅山忽視博士家的權威，而以廣博的學識被家康任用這兩件事做了說明。不過，也因為儒學於近世日本並不像在中國與朝鮮那樣，與地位、權勢有著直接的關係，因此反而使得儒者有多元的發展。例如：五代將軍德川綱吉（1646-1709）、岡山藩主池田光政（1609-1682）、會津藩主保科正之（1611-1672）、水戶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等為政者因為喜好儒學，儒者因而受到提拔，成為幕府或各家大名（諸侯）之智囊。林羅山、山鹿素行、熊澤蕃山、山崎闇齋、新井白石、室鳩巢、荻生徂徠等人都是明顯的例子。

另外，就日本近世初期的儒學書籍，黑住教授亦做了如下的論述。當時與儒學相關的書籍，大多是以假名寫成啓蒙書之類的名言集。也就是說，多半是以中國為素材，將其中對處世有益的句子節錄下來，再用假名加以解讀，教導人們各種處世方針這類的作品。而學者用漢文體寫成的文集等作品之完成及出版，遲至十七世紀末葉方才問世。亦即在「山崎闇齋（1618-1682）、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齋（1627-1705）這些第二代儒者出現的時代，近世日本才真正具備學習儒學的環境。但是，在整個江戶時代卻有無數的「和訓書」相繼出版。這一點若是與儒學本家的中國及漢文作品擁有社會性權威的朝鮮相比，當是饒富趣味的。黑住教授也指出在近世日本的言語世界中，除了少數儒學者的自負和遊藝性的詩文趣味外，一般而言，漢語要

具備實用以上的特權性是不可能的。

有關近世日本儒學的批判風潮，黑住教授分析儒學在日本形成了某種程度的思想市場後，發生「自立門戶」營生之事，此種現象可在藤原惺窩和林羅山辨別儒、佛，甚且對舊儒者的博士家誇示「新註」之情況中窺見其端倪。自年輕時代即對漢學樣樣精通的林羅山在元和九年（1623）被三代將軍德川家光（1604-1651）任用時，便開始揭舉其專一於朱子學的鮮明旗幟，因而遭人批判其為「俗儒」、其學為「俗學」，一般以為林羅山等儒學陷入知識主義而衍生出不單純的買賣行為。此一風潮在整個近世日本，無止盡地持續著。黑住教授引述他的恩師相良亨教授的論文，舉例說明伊藤仁齋之批評山崎闇齋，荻生徂徠之批評山崎闇齋、伊藤仁齋，石田梅岩（1685-1744）之批判伊藤仁齋，懷德堂⁹儒者之批判荻生徂徠等，此類批評形成一個儒學論爭史。彼等儒者各自尋求其自以為正當的「本意」、「道」、「心」。這種純粹化的源流系統若從儒學史的觀點來看，則山崎闇齋的純粹朱子學、山鹿素行的堯、舜、孔子之道（聖學）、伊藤仁齋的古義學、荻生徂徠的古文辭學等構成了種種持續的「批判性精神」運動。有趣的是：彼等同時又將非正統儒學之要素引入儒學體系中。如林羅山引入日本史學、日本文學、神道，山鹿素行引入兵學、和（日本）學，山崎闇齋引入神道，伊藤仁齋則是引入町眾（仕紳）的生活等，都是明顯的例子。

⁹ 懷德堂乃享保九年（1724）由大阪商人成立的鄉學校，又稱懷德書院。先後由三宅石庵、中井甕庵、中井竹山、中井履軒等人主持，至明治二年（1869）廢校。

在本文中，黑住教授也針對宗教領域的死、生、祭祀與儒學的關係做了論述。其述及近世初期的日本，神、佛的信仰根深柢固，且勢力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在儒學和神、佛交涉之際，儒學不得不在此種被蠶食干涉的狀態下主張其存在。例如以孔子為神，從事祭祀，並將釋奠體制化。非但如此，儒學在國家的禮樂、家族（宗族）的禮、祭，以及個人內面的規範等，幾乎在所有信仰的各個場合中均發揮其力量。

黑住教授把宋學解釋為是一將佛教的高度思想力，脫胎換骨後重新構築而成的思想，又說儒、佛可謂是「一丘之貉」（此採用黑住教授之原文），兩者是圍繞神而相互競爭，尤其是佛教藉由寺檀制以確立其管理死後世界的葬祭權，在近世日本社會複雜的思想體制上，要採用儒葬或進行神葬，又衍生了許多爭議，只是一般社會中佛教式的葬儀並沒有被顛覆。到近世中期，儒學的地位逐漸穩定之後，儒、佛各自分立，才停止彼此競爭的狀態。黑住教授將儒學定位為非宗教性的存在，神與佛各自管理生與死之祭祀領域，而儒者扮演著將非宗教性的「學問」提供為世人所用的角色，此即日本近世思想體制中，所謂神、儒、佛「習合」的統一形態。

黑住教授就儒學的道德述及在武士構築的近世日本社會中，儒者有意以儒教道德與倫理將近世社會規律化，這個意圖在德川家康以後更露骨。藤原惺窩、林羅山等儒者，首先用以吸引德川家康等人注意的，就是自身以「道」的傳達者自居。他們注意到儒學中的宋、明理學，強調此為道學，並將之與過去的漢學區分開來。宋學於中世時期傳至日本，首先在神道家或佛僧間流傳，但藤原惺窩、林羅山等儒者則批判彼等而自許為

宋學的專家。近世日本和朝鮮、中國之間的交通大開後，經由船舶運載到日本的書籍資訊中，最具震撼力的就是宋學書籍。近世日本儒者也因此受到極大的刺激與影響，認為其對建設新日本社會將有所幫助，於是宋學才為近世日本所接受。而此皆導因於道學的力量及其於當時所占據的優勢所致。

四

第三篇論文〈戰中、戰後徂徠論批判：以初期丸山、吉川兩學說的檢討為中心〉¹⁰，作者平石直昭先生，現任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科教授。平石先生的指導教授就是丸山真男教授。平石教授乃繼承丸山真男近代主義之批判路線的知名學者，也是研究荻生徂徠（1666-1728）、橫井小楠（1809-1869）、福澤諭吉（1835-1901）、丸山真男（1914-1996）思想史的碩學，現任日本思想史學會會長。

本文主要內容在檢討戰後四十年的日本徂徠學研究史，並針對其特徵做具體的描述。平石教授舉了以下四個檢討「初期丸山學說」的原因：（一）本文所討論的丸山學說是四十多年前寫的舊作，故曰「初期」。因為丸山真男在戰後大大推動了徂徠學研究。（二）平石教授所稱的「初期丸山學說」，當代學者們多未能切實深讀其論文，有時甚至置之不理。（三）平石教授一方面透過對荻生徂徠與福澤諭吉的研究，從中學習，同時又鑽

¹⁰ 平石直昭：《社会科学研究》（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87年）39卷1號。